



# 寡妇船

【苏联】伊·格列科娃著  
程文 王俊义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I51245  
G276

# 寡妇船

【苏联】伊·格列科娃著

程文 王俊义译



\*10004811\*



黄河文艺出版社

8801787

# 寡 妇 船

〔苏〕伊·格列科娃著  
程 文 王俊义 译  
责任编辑 李云阁

黄 河 文 艺 出 版 社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42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6,500册

ISBN 7-5400-0028-7/I·29

统一书号: 10385·99 定价: 2.00元

# 目 次

---

|     |       |
|-----|-------|
| 寡妇船 | ( 1 ) |
|-----|-------|

---

|     |       |
|-----|-------|
| 法 赞 | (207)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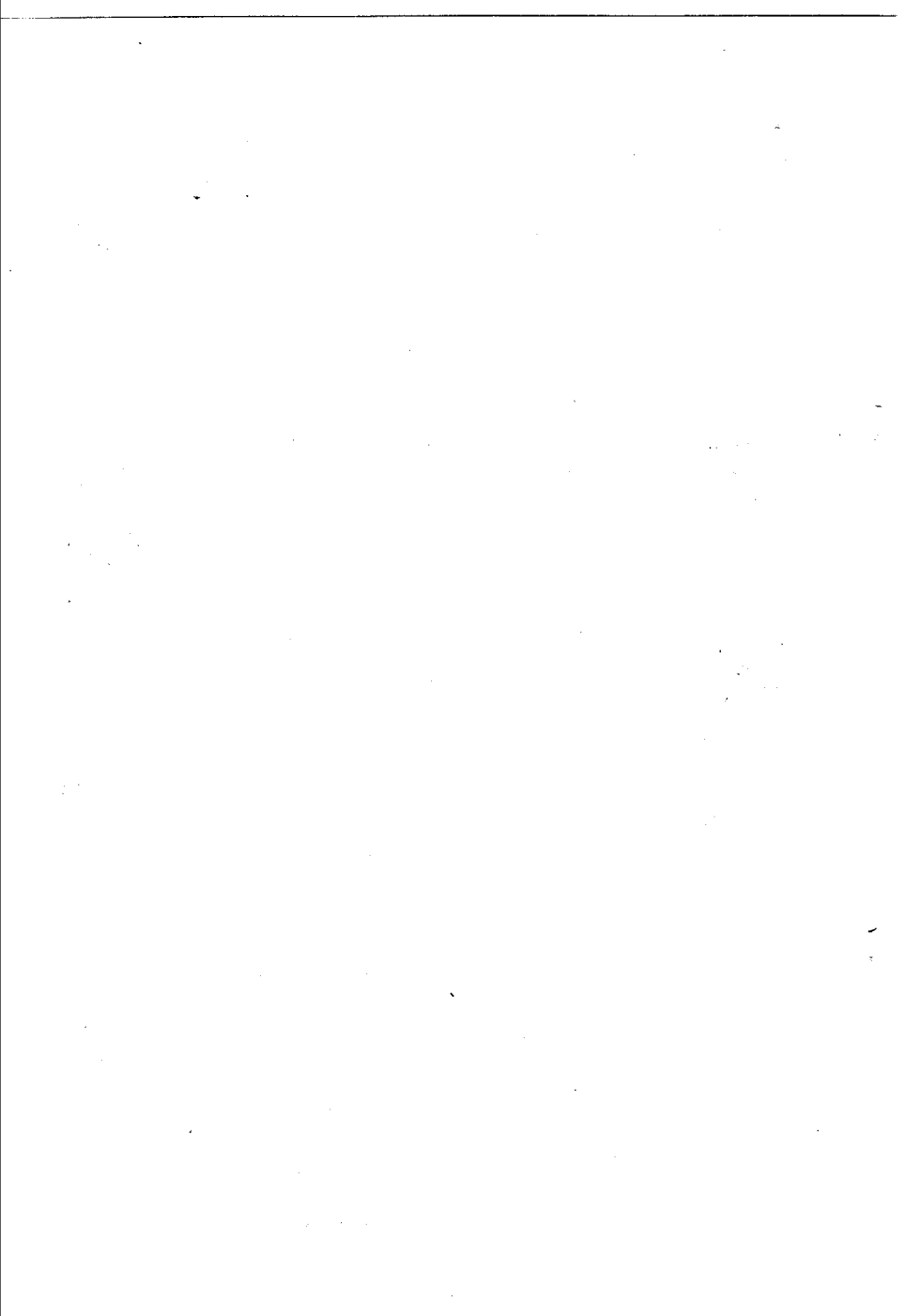
---

|     |       |
|-----|-------|
| 译后记 | (359) |
|-----|-------|

---

# 寡 妇 船





# 1

战争刚开始，我的丈夫就在前线牺牲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我们”是指我、我几乎疲惫得不能迈步的老母和我十四岁的女儿娜塔莎。一种麻木状态使我没能采取行动。我们没赶上及时疏散，后来，乱成一团，再想疏散已经晚了。其实，当时有一辆汽车从我不熟悉的一个机关大院开出来要开往东方，人家表示愿意在车上给我留个位置。大家都匆匆忙忙，不知从哪个档案室里吹出来的各种文件在空中纷纷扬扬。只有一个位置？我当然拒绝了。过后，又犹豫起来：

“是不是把娜塔莎送走呢？”可又一想：“不，我不能把她交给别人。”汽车开走了。回到家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一番，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你做得对，”妈妈说，

“要死就死在一起好啦。”她总是强打着精神，身材干瘦，周身却收拾得干净利落，成天价不停地结毛线活，耳边常听到她手里毛衣针窸窣窸窣磨出声响和嘴唇翕动计算针数的低音。娜塔莎她什么都不懂，每天早晨就知道唱着歌对着镜子打花结。我都感到吃惊，她竟那么轻易地经受住了父亲的去世。现在我明白了，对她来说生活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可当时，我真想打她一顿。

总之，我们留在原地没动，这比较方便，因为无须采取

任何措施。我们似乎是照老样子生活在我们这套老房子里，生活在这套带有高高的圆顶窗户的古老住宅里，窗户对着院子，院里宁静地晾着五颜六色的衣裳，阳台上爬满常春藤，呈现出一派田园景象。我没有工作，常到破烂市上卖点东西，顺手买点或者换点什么吃的。秋天过早地显示出了它的肃杀之气，早晨都已经冻手了，常春藤也变成深红色，枯萎了。生活又开始像个样子，被仓促疏散的那些日子搅乱了的城市秩序又渐渐恢复正常。发了食品购买证，也注意了灯火管制，男孩子们在搜查那些从顶楼用一闪一闪的灯光给敌人打信号的奸细。有一次，我就亲眼看到过这种明亮而可疑的闪光，商店里偶尔也有些不限量的怪食品，比如螃蟹和香槟酒之类。为了买到这些东西，人们排起长队，还一面自我解嘲说：

“我们干吗要排队呢？”我也排过一次这样的队，然后，我们就着螃蟹喝了一夜的香槟酒，娜塔莎叮叮咚咚地乱弹着吉他。这次夜宴真有几份恣意妄行。德国飞机不断空袭，我也不怕它了，我根本什么都不怕了。我仿佛深信，最坏的事我们家都已经摊上，再也不会发生别的事了。况且，比起前一阵子，空袭也不那么频繁了，再说，它给这个城市的广大市容上所造成的后果也几乎看不出来了。瓦砾清除了，很快在废墟上开辟了小公园。城里靠障碍气球治理着——这些巨大的长形气球白天由身穿军装的姑娘们亲手牵线指挥着，夜晚就把它作为机警的守卫者升入天空。它宁静的庞大圆体给人一种可靠感：睡吧，人们。扬声器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他以人们已经习惯的那种清晰的、抑扬顿挫的声调播送着人们已熟悉的那几句话：“公民们，空袭警报。”这话已经不再令人惊慌了，我们一边听着，一边不慌不忙地穿起衣服。防

空洞不在我们院里，是在邻近的一个院子里，当中还隔着一个院子。我老觉得我们在防空洞里边是占了别人家的位置，妈妈又体弱无力，拖她到那儿去，也是件麻烦事儿。有什么必要呢？不管怎么说，防空洞我们是再也不去了。

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空袭警报刚一解除，紧接着又发出警报。娜塔莎从枕头上抬起头懊丧地说：“妈妈，又是警报？咳，可真烦死我了！”我对她说：“没事——没事，睡吧，好孩子。”这就是我们娘俩说的最后几句话，因为恰好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房子被炸毁了。妈妈和娜塔莎都被炸死，我却没有死。这就是所谓大难不死——奇迹。奇迹吗？要说奇迹，这倒是一种相反意义上的奇迹，一种灾难性的奇迹，这种奇迹的创造者正是恶魔自己。我的脊椎骨、一条腿和两条胳膊都骨折了。说来奇怪，当时我的神志却很清醒。我至今还记得倒下来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的那些砖头，可怕地倾斜在我身子上的一扇门板。一个念头：“妈妈呢？娜塔莎呢？”又一个念头：“完了。”人们把我拖出来时，我喊叫着：“小心点！”，我珍惜的是我那双手。

随后，就有一段时间完全不省人事。我所意识到的第一个感觉，是极度的沉重，就是沉重，而不是疼痛。我觉得，还是那些砖头在压着我，不知为什么不给我搬开。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不是砖头，而是石膏。它把我整个儿包了起来。我被活活地禁锢，囚禁在里面。除了沉重以外，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周围是一片昏暗，它不是模糊不清的灰色，而是黑中透红，这只能意味着一点：我瞎了。在黑暗中，不时闪烁着火花，迸发出星星似的亮光。它流动着，而且总是向一个方向流去。有

那么一次，我张开嘴说：“妈妈呢？娜塔莎呢？”但是，什么都没听见，我聋了。

这样一来，在沉寂的黑暗中，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已经失去标志，它只能以流动着的火花的闪烁来显示，这些火花每隔一定的间隙就出现一次，我无法测定它间隔多久，只晓得它是有规律地出现并形成清晰的图画式的节律线。火花本身非常好看，它有点像是活物，或许是像海星，但是它总是确定不移地向一个方向流动，这种特性却不像是来自生物界。

我视力恢复得比听力早一些。经过一段说不准的、但是很长的时间，我才有了光感。这光亮像刚刚破晓，游移不定地晃动着，因为它就像浮游在我面孔上方水蒙蒙的空气中的一条大白鱼，整个房间也显得像个淡灰色的水族馆。我张开嘴试图再说说那句话：“妈妈呢？娜塔莎呢？”又是什么也没听见。白鱼抖动一下身躯，尾巴一摆，很快地从我身边游过，接着又出现另一个。原来，这次不是鱼，而是护士的白头巾。在头巾下那苍白而略带黄色的、微微浮肿的脸上，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目光里流露着关切、惊奇的神情。“这么说，我是在医院里，眼睛还没有瞎，”我想了想，顺着身子向脚的方向看了看。病床上躺着一个白色的、很大的东西，根据它所占的位置来看，这应该是我自己，但又不是，觉得倒像是一种迟钝、笨重的身外之物。人们在往我嘴里灌一种什么热乎乎的、无臭无味的东西。

我的知觉是逐渐恢复起来的，但不是等速地，而是一阵一阵地。继有了光感之后不久，又开始听见了声音，它也像火花突现似的、一阵阵迸发出来，一开始还近乎于病态。有

一次，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女友坐在我身边哭。她哭的声音很大，像在打嗝儿似的。“妈妈呢？娜塔莎呢？”我问，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刺耳，像是在叫喊。我的女友一声不吭，但凭她那面部表情，我明白，她们都已经死了。我从头到脚全身都打着石膏，既不能挣扎，手也不能动弹，也无法寻死。又在往我嘴里灌什么东西。我重又失去了知觉，一片黑暗。好像我曾祈求过黑暗的永存。知觉刚一恢复，又转瞬即逝。心灵上的疼痛不是经常发生的，一旦爆发，便难以忍受，仿佛它要从内部把这石膏撕个粉碎。

自那以后，我在医院里又住了一年，医生们为了我这已经多余的生命进行了一场斗争。在这一年里，起初那种只求一死的强烈愿望，算从我身上消逝了。代之而来的是对石膏的憎恨，是想毁掉石膏而不是毁掉自身的愿望。随后，对窗外世界开始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时而闪现，随之又消失。最初，这个世界只有一侧的目光能看得到，但可以感到它是辽阔的，美好的。后来，当把我的颈椎解放出来，我已经可以转动脑袋的时候，窗外的世界便以其全部的广度展现出来，原来，它的确是那么辽阔，那么美好，室外下着零星细雨，树枝微微颤动，一只只鸽子踱来踱去。这一切是那么清新、鲜明，要比平常生活鲜明得多。是吗，我就从来不曾见过这么蓝的鸽子。后来，这种鲜明感暗淡了些，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直到今天也还保留着。譬如说，那种雨景的鲜明感有时仍使我感到惊讶不已。

是的，我的头部已经能够转动了。现在，我甚至已经在盼望着复元了，如果这可能的话。事实证明，这是可能的。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美好日子里，把我全身的密封石膏拆除

了，感到轻松得令人欢心，几乎感觉不到份量了。这一天，我同在阳光充足的病房里轻盈地飞来飞去的苍蝇成了亲密的朋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已经能坐在病床上使用双手吃饭了。那时候，一点贫乏得可怜的食物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占有非同小可的位置，那些没有挨过饿的人对此是难以理解的。吃饭几乎变成了一种仪式。我很奇怪，当时竟是怀着那么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来送饭，但确曾有过这种心情。随着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和餐具的哗啦声，一个穿着破软底便鞋、露着琥珀色脚后跟的女护理员走进来，开饭了。我吃过饭，然后就睡觉，就像吃奶的婴儿那样久久地、沉沉地睡。

出院时我才发现两只手部分地失去了活动能力，这意味着又是一种不幸，因为我的职业是弹钢琴。不过，这种不幸同其它的不幸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了。看来，我也不是那种真正有天赋的人。天赋留给我的只是一种狂热的良心，是这种良心迫使我无休止地练习，白天在钢琴上练，夜间空手练，用手指在膝盖上敲打，我对自己极度不满意，但光不满意是不够的。我被定为三级残废，让我回到了生活之中。我还记得我走出医院大门迎接这新生活的情景，阳光照得我头晕目眩，我的一个女友搀扶着我的胳膊，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吸着气。

出院后的头几个星期，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里。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开始张罗住处。“你这何必呢？”我的女友说。“就在我这儿过吧。”不，我不能这样做。说起来也难为情——我真生她的气了。她完全沉缅于一种自我牺牲之中，爱唠叨，又好争吵，经常擦眼抹泪，好像还要求我也像她一样。但我不能哭——积聚在我内心的一切不是诉诸眼泪

就可以……而她的关怀又是那样的专横！都能使您发疯。比方说，因为我没带围巾上街，她就大动肝火，对我大吵大嚷。好像一条围巾能有多大的意义。好像我本人还有多大的意义。好像我们这些面对着世界上发生的这样重大的事件而无所作为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她不听广播，不看报纸，完全陷于惊慌失措的碌碌奔忙中。吃饭时，她关怀备至地把食物分成不等的两份，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那份多的放在我的面前，我不接受，于是就开始一场互相把盘子推来推去的滑稽戏……不能这样下去，我得有自己的一隅之地，得有个自己能够生活下去的栖身处。

区苏维埃很快就分给我一间房子，这不知是原来住户搬迁了，还是死了之后腾出来的。房间本来不大，又是个长方形，天花板又很高，被烟熏得黑黢黢的，所以就显得更加狭小。一扇窗户朝着后院，院子里并排摆着几只浅蓝色的垃圾桶，一只鲜艳的橙黄色的公猫，自管像举着一面旗帜似的翘着尾巴，雄赳赳地走过。这一切，特别是辉映在公猫火红的皮毛上的落日余晖，使我感到美得出奇。原来的住户在房间里丢下一张显然是毫无用处的破床：床网全坏了，一些地方胡乱地用绳子绷着。我往床上一坐，床网就沉了下去，吱吱嘎嘎响起来。膝腕下的铁床棱冰冷彻骨。真的，这一切我都喜欢，但愿将来也能保持这种空荡、简单和鲜明的色彩。我不想添置东西。据说，一旦轮船的船底长满了贝类就会丧失航行速度。我不愿丧失航行速度，尽管我已经走投无路。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依稀感到一种缓缓的行速，像一种福分似的，在吸引着我。说起来，不喜欢要很多东西这已经成了我本性难移的怪癖。

我的女友给了我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床垫、一条被子、锅碗瓢盆和衣物。她还想再多给我一些，对我奉献一切，但是我没有接受。我记得，为了一件她称为小沙发的矮凳还发生了一场无谓争吵——我真不愿意让她把像只癞皮狗似的东西放进房间。女友执意要拿进来，我干脆说：“我宁肯死了，”于是她又哭了，可我没哭。现在我很懊悔当初我没要。

我们就要分手了：我的女友很快就得去西伯利亚一个什么地方，找她已经结婚的女儿去。她生怕离开这里，一提到要走，她就哭个没完，可我却是一副铁石心肠。其实，我本该理解她的担忧，她的劳顿和她不祥的预感……泪水顺着她那瘦小的面颊流着。为了给我留个地址，她戴上老花镜，看到她那副衰老的面孔，我才蓦然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分手时，她塞给我一小叠钱，说：“等以后有了再还我。”后来很快她就死了，这笔钱我也就没能还给她。我不晓得她的坟墓在哪里，也不晓得坟头上是否生长着野花，都是些什么花儿。我试图把欠她的钱汇给她女儿，可是汇票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收款人已离去”。这笔未能偿还的债务，也如同我欠下的无数其他债务和过错一样，至今还在折磨着我。

我的女友走了，我形影相吊，孤身一人。一无亲人（全都死了），二无同事（全都各奔他乡），甚至连个邻居也没有（房子炸毁了，房子的旧址上已开辟为小公园）。以前，还有各种各样的操心事（你为别人操心和别人为你操心）在支撑着你。“无忧无虑”这句话通常都伴随着一种幸福的含意。可实际上，无所用心的生活是何等的孤寂难耐，何等

的茫然无措啊！过了很长时间，我总算适应了这种生活。最初，我连饭都不能做；我觉得自己做饭自己吃无异于野人的生活。

女友留给我的钱快用完了，应该干点工作了。当然，对于原来的专业是连想都别想了，我能毫无怨言地顺应这种现实，谁晓得呢，也许我还在暗自庆幸，这下再也不必为自己缺少天分而苦恼了……对我来说，在哪儿工作都无所谓，但我能干什么呢？又会干什么呢？体力劳动我不行了。脑力劳动呢？多半也是……

“您受过什么教育？”人家问我。

“音乐学院毕业……”我很难为情地答道。“钢琴系。”

“您能弹吗？”

“不能。”

“让您干什么呢，同志？我们考虑考虑。您再来一次吧。”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考虑，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但工作始终没有。我活像个苦苦哀求救济的乞讨者。每当遭到拒绝（虽不是当即拒绝，却是每每如此）后，我就只好用颤抖的双手收拾自己的东西：装面包或土豆的小口袋、疙疙瘩瘩的拐棍和装着开给我的代替证件的一些证明信的小手提包。这些证明信时常散到地板上，我强忍着自身残废和周围人们的怜悯所带来的痛苦把它从地板上拣起来，有时，人们坐在那里，也忙活着帮我拣，以表示他们对我的怜悯之情。然后，我围上围巾连头都不回就走了，生怕人们看到我那乞丐般的神情会施舍我钱。

几个月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我已经开始不抱希望了，却又突然给了我工作！是的，这是个真正的工作，去孤儿院当音乐教员。

“是什么孤儿院？”

人家对我解释说：类似儿童保育院，不过只收从出生到三周岁的最小的孩子。简而言之，类似托儿所。分配给我工作的人这样“简而言之”，他是艺术教育干事，是个膀粗腰圆的年轻男人，壮得怕人，鼻孔里露着棕红色的鼻毛。他桌子上摆着上百份文件、各式各样的打孔机，案卷堆积得高过他的头。他一边和我谈话，一边有节奏地敲着铅笔。

“喂，怎么样？都清楚了吗？”

我犹豫不决。这个建议使我感到惶恐，我本来就缺乏自信，这下我更没有底了。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可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件工作，而为了生活下去就非工作不可。一定要活下去，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应该活下去！我从来不曾这么渴望生活。这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那街道的淡紫色的柏油路面，天空中倏忽而过的云雾，那些作为生命不息的顽强象征、从泥雪下破土而出的陈年小草的幼芽……无不使我感到高兴，使我兴致勃勃。还有那些有生命的东西：小猫，鸽子，以及那些闲不住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孩子们！且莫这样理解我，仿佛我忘却了自己的痛苦。不，痛苦在我的内心深处，这痛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生活有着对我无法估量的吸引力……

他极其果断地敲了一下铅笔，说：

“我在等你答复呢。您对这个工作满意吗，弗廖罗娃同志？”

这一敲的意思是说：别耽搁时间。甚至对他，对这个健壮的男人，我也感到很有意思。

“满意倒是满意，不过……就怕不能。”

“不要紧！‘小黄鹂，你在那里？’”<sup>①</sup>他用假嗓子唱道。“怎么样？您能弹这首《小黄鹂》吗？”

我看了看自己的两只手，活动了下手指。手指还能动。

“看来，还能弹。”

“那太好啦。我们给您开一封去孤儿院的介绍信。您不要害怕嘛。高兴一点，高兴一点，大妈！”

好象这还是我生平头一次听人家叫我大妈，可当时我还不不到四十岁。后来，叫我什么的都有了——有的叫我大妈，有的叫奶奶，也有的亲切地称呼我老奶奶。甚至也还有叫我老妖婆的。我走路时佝偻着身子，拄着一根像拐杖似的棍子，小孩子们跟在我的后边一边跑，一边喊：

“老妖婆，瘦腿老妖婆！”

一切都会习惯的。

## 2

我被分配去工作的那个孤儿院，在一条巷弄里，那里几乎已经不能算是莫斯科了，那儿与莫斯科总的面貌相比像是边远、僻静的外地。长着枝叶繁茂、洞穴累累的古树，树下是倾斜的、错落拥杂、斑斑驳驳的小房子，如同所有久经风

---

<sup>①</sup>这是十九世纪流行在俄国贵族上流社会的一首戏谑祝酒歌的头一句。